



比丘林與俄國漢學

Iakinf Bichurin and Russian Sinology

閻國棟 (Yan Guodong)

南開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

Department of West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19世紀初，俄國加緊了對東方的擴張。沙皇政府已經不滿足於18世紀形成的外交以及商業往來方式，迫切希望與中國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繫。1805年，俄國藉口向中國皇帝通報俄國新沙皇亞歷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登基，派出了以戈洛夫金（Ю.А.Головкин, 1762-1846）為特命全權大使的使團，隨行的有許多知名科學家，如東方學家克拉普羅特（Г.Ю.Клапрот, 1783-1835）、天文學家舒別爾特（Ф.Т.Шуберт, 1758-1825）等，翻譯是曾在北京居留14年的俄國東正教駐北京第七屆傳教士團學員弗拉德金（А.Г.Владыкин, 1761-1811）。俄國政府對戈洛夫金使團出使中國非常重視，為其制訂詳細的任務及向中國皇帝遞交國書的禮儀。但是，當使團走到庫倫時，清朝官吏要求他們對著中國皇帝的牌位演練遞交國書時的叩頭儀式。戈洛夫金拒絕聽從，認為有損俄國沙皇的尊嚴。在經過30天毫無結果的談判後，只好返回俄國。俄國在戈洛夫金出使中國失敗後，開始著手派出下一屆傳教士團。1807年，東正教第九屆駐北京傳教士團從俄國出發，於1808年順利到達北京，領班就是後來成為俄國漢學奠基人的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 1777-1853）又稱亞金甫神父（О.Иакинф）。

● 壹

比丘林原名尼基塔·亞科夫列維奇·比丘林斯基

（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Пичуринский），1777年9月出生於喀山省（Каза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斯維亞加縣（Свияжская волость）阿庫列沃村（село Акулево）楚瓦什族（чуваш）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個神父，名叫亞科夫·丹尼洛夫（Яков Данилов）。1786年，比丘林進入喀山傳教士學校¹（Казан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семинария）學習。1799年畢業後留校任語法教師。同年成為修道士，法名亞金甫（Иакинф）。比丘林之所以接受剃度，是由於做修道士可以獲得許多好處。首先，只有成為修道士，才有可能寄身高層宗教職務。其次，像他這樣做教師的修道士，即使不去教堂，每年也可以得到128盧布的補貼。所以，比丘林一方面在神學院教書，同時又在喀山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Александро-Невская Лавра）擔任修士司祭的職務。1801年，比丘林被任命為喀山約阿諾夫斯基修道院（Казанский Иоанно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院長。1802年晉升修士大司祭，出任伊爾庫茨克主升天修道院（Иркутский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院長和傳教士學校主持。1803年因違背誓約被削職，調到托博爾斯克修道院（Тоболь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1807年，經戈洛夫金推薦，擔任俄國東正教駐北京第九屆傳教士團的領班。此屆傳教士團成員包括3名司祭、兩名下級人員、4名學員和一名監督官。俄國外交委員會為傳教士團下達詳細的指令，包括調查英國在華政策、中國人對英國人的態度、英國在華商人的數量以及中國市場上主要出售什麼英國商品等內容。此外，傳教士團還須查明戈洛夫金出使失敗的原因以及土爾扈特人返回中國後

1 1798年改名為喀山神學院（Казан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академия）。



的情況。

1807年10月，比丘林率領的傳教士團從俄國出發，1808年1月10日來到北京。在來華後的一段時間內，他集中精力，整頓教務。當時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成員紀律渙散，清廷理藩院經常致函伊爾庫茨克總督，反映他們的不良行為。為嚴明紀律，比丘林對下屬採取嚴厲的懲罰措施，但並未取得明顯效果，反而得罪了許多人。1811年沙皇政府忙於與拿破崙作戰，停止向傳教士團提供經費。比丘林不得不出賣或典當傳教士團的財產。比丘林曾試圖保持阿爾巴津人²的東正教信仰，但收效甚微。他發現阿爾巴津人信仰東正教不是為了耶穌，而是為了得到麵包。自此，他對傳教失去了信心，開始輕視所承擔的宗教使命，而幾乎把全部精力用於對漢語的學習和對中國的研究。

在北京的頭幾年，比丘林除了學習漢語外，還學習滿語和蒙古語。當他發現中國的主要典籍都是用漢語寫成，而滿、蒙語文獻大都譯自漢語時，便放棄了其他語言的學習，而專攻漢語。他在學習上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完全沒有教材，沒有必須的漢俄詞典。他一邊學習，一邊開始收集漢語辭彙，4年後編寫出一本漢俄詞典。早在喀山神學院時，比丘林就已經掌握了拉丁語、希臘語和法語，因而與北京的耶穌會士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有機會看到葡萄牙傳教士收藏的西方漢學家的作品。他重點閱讀了曾德昭（Alvarez Semedo, 1586-1658）、杜赫德（J. B. Du Halde, 1674-1723）等人的著作。這顯然加快了比丘林對中國的認識過程，促進了他對漢語的學習和領悟。到北京7年後，在中國先生的建議下，他翻譯了中國儒家經典《四書》，並作了詳盡的注釋。他從此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只有徹底領悟《四書》，才能將其其他中國經典作品翻譯得更好。而後他又翻譯了一系列漢語典籍，內容包括中國歷史、地理、政治以及醫學。

1816年，比丘林給俄國東正教事務管理總局（Синод）寫了一封長信，總結了第九屆傳教士團8年多的工作，認為俄國傳教士團在華一百年來的存在沒有為科學作出應有的貢獻。在他之前所翻譯的漢滿語典籍不僅錯誤百

出，而且佶屈聱牙。列昂季耶夫（А.Л.Леонтьев, 1716-1786）譯自漢語的詞典有許多錯誤，有些地方晦澀難懂。弗拉德金編寫的滿俄詞典又過於簡短。他提出有必要對中國進行深刻的研究，研究領域不應限於中國的歷史、地理、醫學等外國人感興趣的課題。他說，如果細心考察這裡的醫學和植物學，會發現許多新奇的東西。他發現中國人很早就開始接種牛痘了，中國的詩歌具有獨特的韻律，中國文論闡述了與西方相似的作文規則。他請求東正教事務管理總局允許他在北京再留任10年，以完成他龐大的翻譯和研究計畫，幫助新來的傳教士團成員更快地掌握當地語言。結果，比丘林又在中國待了6年，進行《通鑑綱目》、《大清一統志》等中國典籍的翻譯。但他未能完成另一個心願，即幫助新來的成員學習漢語，因為他沒有被任命為下一屆傳教士團的領班。1820年，由卡緬斯基（П.И.Каменский, 1773-1845）率領的俄國東正教第十屆駐北京傳教士團抵達北京，監督官為後來對比丘林的命運產生過很大影響的季姆科夫斯基（Е.Ф.Тимковский, 1790-1875）。

比丘林在北京一共度過了14年。返回俄國時帶走了12大箱漢滿書籍、一箱手稿、一箱顏料和6大卷地圖與平面圖。這批書中包括5本漢語詞典、兩本滿語詞典、一部43卷的中國歷史、漢滿文的滿族歷史、《四書》、《三字經》、《金史》、《遼史》、《元史》等。途經恰克圖時，比丘林結識了當地商人伊古姆諾夫（Николай Игумнов）。伊古姆諾夫在與比丘林的交往中萌生了開辦一所漢語學校的想法，而比丘林則感到有必要寫一本漢語語法課本。

1822年1月，比丘林一回到聖彼得堡，立刻受到俄國東正教事務管理總局的審查。當比丘林還在北京的時候，一些傳教士團成員由於對導致團裡貧窮狀況的原因不甚瞭解，對比丘林的嚴格管理心懷不滿，對他要求所有人努力學習漢滿語的作法難以忍受，不斷向國內寫信狀告比丘林。伊爾庫茨克總督也抱怨駐北京傳教士團的一些成員行為不軌。但最後起決定作用的是新任傳教士團領班卡緬斯基，他向東正教事務管理總局寫信，指責

2 1665年，以切爾尼戈夫斯基（Никифор Черниговский）為首的一夥哥薩克佔領位於黑龍江中游的雅克薩，修築起俄國文獻中稱為阿爾巴津的城堡。清康熙皇帝於17世紀80年代兩次出兵雅克薩，收復了失地，同時俘虜了近百名俄國軍士，其中45人被押解到北京後被編到八旗軍鑲黃滿洲第四參領第十七佐領，駐守在北京東直門內胡家園胡同。在俄國文獻中，這部分人及其後裔被稱為阿爾巴津人。



比丘林把傳教士團搞得一團糟，做了一些與其宗教使命不符的事情。比丘林的案子被送交宗教裁判所審理，而他本人則被軟禁在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調查持續了一年。1823年9月4日，比丘林被判終身監禁在當時作為隔離俄國神職人員的瓦拉姆修道院（Валаам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對他的指控主要有12年裡沒有去過教堂、變賣教堂財產、荒廢教務以及對屬下管理不善等等。

有關比丘林在瓦拉姆修道院的情況沒有什麼文獻保存下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離開後最先發表的那些著作都是在隔離中完成的。蘇聯學者在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發現了兩封比丘林從瓦拉姆修道院發出的信。一封是寫給俄國著名發明家、東方學家、科學院通訊院士希林格（Пауль Шиллинг-Канштадт, 1785-1837）的，這證明他與後者即使在監禁時期也保持著聯繫。另外一封信沒有寫收信人，內容是請求一位高官幫助他擺脫監禁生活。他詳細介紹了自己被任命為傳教士團領班的經過，後悔當初不該在去北京的途中向總理大臣狀告伊爾庫茨克總督，以致遭到後者的報復。他談到了學員們對他不滿的原因，說卡緬斯基受到了一些對他有成見的傳教士團成員的矇騙。在信的末尾，他不無自豪地說，他在北京13年來所作出的成就比傳教士團在過去一百年中取得的成績還要大，而現在已經絕望了，因為他無法用他的著作來報效祖國了。比丘林在囚禁中沒有中斷他的學術工作，繼續翻譯中國典籍，整理手稿，3年裡完成了一系列著作和譯作，有《西藏志》（Описание Тибета в нынешнем его состоянии. С картой дороги от Ченду до Лхассы）、《蒙古紀事》（Записки о Монголии сочиненные монахом Иакинфом.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карты Монголии и разных костюмов）、《準噶爾和東土爾克斯坦》（Описание Чжунгар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в древнем и нынешнем состоянии）、《北京記述》（Описание Пекина.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плана сей столицы, снятого в 1817 г.）、《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История первых четырех ханов из дома Чингисова）、《三字經》、《西藏青海史》（История Тибета и Хухунора, с 2282 г. до Р. Х. до 1227 г. по Р. Х., с картой на разные периоды сей истории）、《厄魯特人或卡爾梅克人歷史概述（15世紀迄今）》（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ойратов или калмыков, с XV столетия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等等。

1826年，由於俄國外交部急需漢語譯員，經季姆科夫斯基推薦，比丘林於11月1日獲釋。他被安排住在聖

彼得堡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每年可以從外交部領到1200盧布的薪金和300盧布的著作補貼。由於比丘林在監禁時期就已經完成了許多著作，所以他得以在被釋放後的短時間內出版了大量著作。俄國科學院對比丘林的作品非常重視，於1828年推選他為東方文學和古文物通訊院士。1829年1月7日，俄國公共圖書館館長奧列寧（А.Н.Оленин, 1763-1843）致函國民教育部，要求聘任比丘林為圖書館榮譽館員，整理館藏漢滿文書籍。在圖書館，比丘林認識了當時同為館員的俄國著名寓言作家克雷洛夫（И.А.Крылов, 1769-1844）、科學院院士弗林（К.М.Френ, 1782-1851）、比丘林著作的主要評論者先科夫斯基（И.Ю.Сенковский, 1800-1858）等人。

比丘林發表文章最多的雜誌是《莫斯科電訊》（Московский телеграф），一共有7篇。其中比較著名的是與德籍東方學家克拉普羅特（Н.Я.Кlaproth, 1783-1835）就蒙古學問題的論戰文章。雜誌主編、俄國作家兼東方學家波列沃伊（Н.А.Полевой, 1796-1846）積極支持這兩位著名東方學家的學術爭論，提供了充足的版面。比丘林的文章全部用漢語資料寫成，特點鮮明，為他後來撰寫總結性專著奠定了基礎。比丘林的科研成果引起了俄國社會科學界的極大關注，名聲也越來越大。他經常出席俄國作家、音樂家奧多耶夫斯基（В.Ф.Одоевский, 1803/1804-1869）公爵家舉行的周末聚會，與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 1799-1837）、克雷洛夫、巴納耶夫（И.И.Панаев, 1812-1862）等社會名流頻繁接觸。此外，通過《莫斯科電訊》雜誌他又結識了一些俄國文化界精英。

1830年比丘林在隨希林格考察團考察恰克圖（Кяхта）時，結識了以別斯圖熱夫（Н.А.Бестужев, 1791-1855）為代表的一些十二月黨人。可能是受到希林格和別斯圖熱夫的影響，比丘林開始感到他的法名以及僧袍嚴重束縛著他的生活。儘管他已經54歲了，仍然決定擺脫套在自己身上的無形枷鎖。1831年3月，比丘林向俄國東正教事務管理總局提出申請，要求脫離教籍。比丘林的行動得到俄國外交部的支援。東正教事務管理總局最後同意了比丘林的要求並上書沙皇核准。但是，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駁回了宗教機構的呈文，命令比丘林繼續在聖彼得堡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供職，不准脫離教籍。沙皇反對比丘林還俗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後者與十二月黨人關係密切，而這恰恰又是沙皇最為反感的事情。



隨著19世紀中俄貿易的不斷發展，恰克圖商人迫切要求建立一所漢語學校。此事在1821年比丘林從北京返回俄國途經這裡時就已經提到過，這次比丘林又來到恰克圖，當地商人們的願望終於得以實現。1830年1月，比丘林自費開設了一個漢語班，1832年正式成立恰克圖漢語學校（Кяхтинская школ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1838年比丘林回到聖彼得堡，由克雷姆斯基（К.Г.Крымский, ?-1861）繼續漢語教學。一直到喀山大學漢語教研室以及後來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的建立，漢語學校逐漸失去了存在的價值。1862年恰克圖地方當局下令關閉學校，1867年俄國政府正式下達了關閉學校的文件。恰克圖漢語學校的建立以及比丘林的漢語教學活動促使他於1835年出版了《漢文啟蒙或漢語語法》（Хань-вынь-ци-мын, или 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一書。

19世紀40年代，比丘林科研進入第二個時期，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不只一次獲得科學院傑米多夫獎金。³ 他的著作在俄國乃至西方漢學界引起強烈反響。俄國著名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 1811-1848）對比丘林的著作給予很高的評價。普希金在看了比丘林的書後萌生了前往中國去的想法。比丘林的最後一部著作是1851年出版的《古代中亞各民族歷史資料集》（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同樣獲得了科學院的傑米多夫獎金。1853年5月11日，比丘林在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去世，安葬在修道院的墓地裡。在他的墓地上立有「無時勤勞、垂光史冊」的漢文墓碑。

● 貳

比丘林把畢生獻給了漢學研究事業，以其浩繁的著述引起了俄國社會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為俄國漢學的許多領域奠定了基礎。他在編寫漢語詞典和漢語教科書、翻譯和撰寫中國歷史、地理、政治以及邊疆少數民族史地著作方面均有建樹。

一、編寫漢俄詞典

在北京時期，比丘林在漢語學習方面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沒有教材，特別是沒有一本漢俄詞典。比丘林決定在學習漢語的同時自己編寫漢俄詞典。他希望能將漢語中最常用的辭彙收入自己的詞典，將活生生的口語作為辭彙的主要來源。為此他穿上中國人的服裝，走街串巷，出入集市店鋪，用手指著感興趣的物品，請人用漢字寫出名稱，並記錄發音，然後將記錄下來的字詞向自己的漢語老師逐一加以驗證。他經常與一位名叫丹尼爾（Даниил）的中國入教農民和阿爾巴津人阿列克塞（Алексей）交談，這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他很快掌握了漢語口語，促進了漢語詞典的編寫工作。比丘林在北京4年後便寫出了一本漢俄詞典。但他並沒有就此滿足，很快就開始編寫另一部規模更大、需要耗時數年的大型漢俄詞典。阿多拉茨基（П.С.Адоратский, 1849-1896）是19世紀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團的歷史編纂家，曾在1886年的《東正教話友》（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собеседник）2、3、5月號上連載長文〈亞金甫·比丘林神父（歷史評傳）〉（Отец 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этюд）。他認為比丘林在北京編寫過兩部詞典，一部是《按照俄文字母順序編排的漢語詞典》（Словарь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по русскому алфавиту），另一本詞典名稱不詳，篇幅不大，其中漢語辭彙是按照事物的特性加以分類排列的。但是，蘇聯科學院院士科津（С.А.Козин, 1876-1956）1929年在《科學院通報（人文科學卷）》（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Отделение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第5期上發表文章〈關於亞金甫·比丘林的未發表著作〉（О неизданных работах Иакинфа Бичурина），對比丘林遺留的手稿進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他認為比丘林共編寫過6部詞典。蘇聯漢學家丘古耶夫斯基（Л.И.Чугуевский, 1926-2000）1959年發表在《東方學問題》（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第6期上的〈東方學研究所收藏的比丘林著作〉（Бичуринский фонд в Архив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一文中指出，僅在東方研究所就保存了有5部比丘林所編寫的詞典手稿。在列寧格勒大學圖書館發現了比丘林的3部詞典手稿，其中一部便是比丘林在北京時期計劃編寫的那本大部頭詞典——《漢俄語音詞典》（Тонический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比丘林為編寫這部詞典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不斷充實辭彙，參考了《康熙字典》，前

3 1832年到1865年聖彼得堡科學院用俄國貴族傑米多夫（П.Н.Демидов, 1798-1840）的捐款頒發給發表科學、技術和藝術著作者的獎金，是俄國最高科學榮譽獎。



後釐清 4 次。完成後的《漢俄語音詞典》包括 9 卷，全部辭彙按照俄文字母順序排列。

二、編寫教科書

《漢語語法》是比丘林最重要的漢語語言學著作。編寫此書的直接動機是爲了給他親自創辦的恰克圖漢語學校提供實用的漢語教材。《漢語語法》是比丘林經數年逐步修改、補充，成爲一本完善的漢語教科書。第一個版本寫成於 1830 年，書名叫《漢語語法基礎》（Основные правила 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在聖彼得堡石印出版，印數很少。後來，比丘林在恰克圖漢語學校的教學中對教材進行了試用，不斷地加以改善。從 1832 年開始，比丘林對全書進行重新編寫，1835 年出版新版本，名稱叫《漢文啓蒙或漢語語法》（簡稱《漢語語法》），並帶到恰克圖。1836 年他完成《漢語語法》第二部分的編寫工作，將新的內容融進以前的版本，於 1838 年出版了第三個版本。70 年以後的 1908 年，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將比丘林的《漢語語法》作爲最好的漢語參考書，在北京再次印行。

比丘林編寫《漢語語法》時參考了西歐漢學家的著作。他對法國漢學家雷慕沙（A. Remusat, 1788-1832）的著作評價較高，對他的智慧和勤奮深表欽佩。他指出，儘管雷慕沙的漢語知識是在法國自學的，但他的漢語修養非常好。就比丘林的《漢語語法》，曾有人在《祖國之子》（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等雜誌上發表過幾篇書評，但大都流於簡介。只有俄國科學院院士、東方學家布羅塞（М. Ф. К. Броссе, 1802-1880）在〈亞金甫神父漢語語法分析〉（Разбор 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монаха Иакинфа）一文中對比氏著作的特點進行了研究。他認爲這是繼雷慕沙的漢語語法出版之後的又一本爲作者帶來很高榮譽的漢語語言學著作，是恰克圖漢語學校得以創建和發展的重要因素。1839 年，比丘林因《漢語語法》一書第二次獲得俄國科學院傑米多夫獎金。

1829 年，比丘林石印出版他翻譯的《三字經》。全書共 83 頁，除俄文譯文外，收錄了漢語原文。在前言中比丘林簡要介紹了《三字經》的內容，指出他翻譯此書的目的是要使其成爲漢學家們的漢語翻譯參考手冊，並感謝希林格發明的漢字字模，使他得以刊印《三字經》的漢語文本。波戈金（М. П. Погодин, 1800-1875）在《莫斯科電訊》1829 年第 30 期發表評論，鼓勵作者繼續翻

譯此類作品，認爲這要比雷慕沙翻譯中國小說更有意義。另外一個評論發表在《北方蜜蜂》（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雜誌上，作者是列昂季耶夫斯基（З. Ф. Леонтьевский, 1799-1874），他特別讚賞書中刊印的漢語原文。由於此書是俄語漢語對照，在 19 世紀 30 至 40 年代一直是喀山大學的漢語教材，同時成爲聖彼得堡大學 50 年代的教科書。

三、有關中國歷史、地理、政治、風情的翻譯和著述

在北京的最後幾年裡，比丘林進行了《大清一統志》翻譯，手稿現存在韃靼斯坦共和國國家中央檔案館，同時翻譯了《通鑑綱目》，手稿現存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檔案館。在這兩部手稿上都標有 1825 年字樣，而這正是比丘林在瓦拉姆修道院的時候，所以，我們能夠斷定比丘林是在被關押期間最終完成這兩部譯著的。通過翻譯這些中國歷史名著，比丘林更能掌握古典漢語，更加深刻地瞭解中國的歷史、地理和文化。

比丘林爲完成譯著《北京記述》傾注了極大的心血。此書內容摘譯自中國典籍《鎮元史略》，介紹紫禁城、皇城、內城、長安門外的名勝古蹟、安定門、西直門、外城，書後附有他於 1817 年繪製的北京地圖。相傳比丘林爲了繪製此圖，走遍了北京城所有大街小巷，步行測量了距離。此書於 1829 年在聖彼得堡出版，立刻引起俄國以及國外出版界的關注。幾乎與俄文本同時在聖彼得堡出版了法文本。德國漢學家克拉普羅特寫了書評，給予較高的評價，但同時也批評作者沒有列舉出他所使用過的漢語參考書。

1840 年，比丘林出版一部關於中國的著作《中國，其居民、風俗、習慣和教育》（Китай, его жители, нравы, обычаи, просвещение），介紹許多中國文化知識、人民的日常生活習俗以及清朝的國家管理體制。全書目錄如下：漢語及其文字；中國簡明統計資訊、中國教育一瞥；學校；教學及天文研究機構；翰林院；社會及個人生活；房屋的建造和布局；紀年；宗姓；族名；宮廷及居家禮儀；儀式；節日；食物；法律；報刊；風俗。該書出版後，先科夫斯基領導的《讀書文庫》（Библиотека для чтения）1841 年第 14 期發表評論說：「書的名稱、作者的名字以及他以往出版的作品等情況促使我們期待他



有更好的著述。」所以如此，是因為比丘林寫此書所面對的是廣大社會讀者，在某些專家看來，似乎有些太過淺顯易懂。先科夫斯基寫到：「我們漢學家的新作好像不是專家所寫，因為難以在其中找到新穎內容，但卻可以大大滿足那些急於瞭解中國知識的普通讀者的好奇心。」這些評論促使比丘林重新審視自己第一部介紹中國文化著作的得失。他決定撰寫另一部學術性極強的著作《中華帝國統計概要》（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中華帝國統計概要》於 1842 年在聖彼得堡出版。該書第一部分描寫中原地區，具體章節為：邊界；名稱；地理概況；植物群系；動物區系；居民；宗教；教育；軍事教育；民間工業；商業；度量；錢幣；郵政；國家預算；歷史概論；當今行政區劃；統治方式；刑法。第二部分描寫了滿洲、蒙古和東土爾克斯坦地區，具體章節為：滿洲；地理概況；居民；教育；工業；商業；行政區劃；蒙古、東土爾克斯坦；西藏。在書的附錄中描述了中國的水路交通，中國的茶葉生產以及黑龍江和朝鮮的概況。這部著作內容非常豐富，多少年來一直是漢學家們重要的參考書。書中所附的中國地圖更是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比丘林因此書第三次獲得了科學院傑米多夫獎金。

1844 年 11 月，比丘林在一封寫給波戈金（М. П. Погодин, 1800-1875）的信中稱他已經完成了《中國的民情和風尚》（Китай в гражданском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一書的撰寫，希望能夠有機會出版。此書直到 1848 年才問世，其中許多內容曾作為單獨的文章在報章雜誌上發表過。全書分 4 章，目錄如下：第一章：國家體制之基礎；曆法、度量衡、貨幣；國家體制、經濟、司法。第二章：國家司法基礎；皇族宗親；八旗軍士的逃亡。第三章：教育；教學及學術機構；經濟管理部門、糧食政策、米店。第四章：中國人的社會及個人生活。宮廷禮儀；民間習俗。該書出版後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使比丘林再一次獲得了傑米多夫獎金。別林斯基在當年的《當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雜誌第 7 期上發表評論，對此書給予了較高的評價。1859 年出版的《先科夫斯基文集》（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第 6 卷上發表了先科夫斯基的評論。蒙古學家科瓦列夫斯基（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ий, 1800-1878）就此書意義在俄國科學院做了報告。

1844 年，比丘林根據《授時通考》編寫出版了《中

國農業》（Земледелие в Китае. С семьюдесятью двумя чертежами разных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их орудий）一書，目錄如下：農具；耕地；耙地；播種；肥料的製作及使用；滴灌與培土；灌溉；收穫；糧食加工。書後附錄了 72 種中國農民使用的農具圖。1842 年比丘林在給波戈金的信中稱他馬上要完成一部介紹中國農業的著作。他說他早就想寫一本描述中國農業的書，但又覺得沒有什麼必要，無論對他或是讀者都沒有什麼益處，因為中國位於北緯 24-40 度，而俄國在北緯 40-60 度之間，所以一直拖到現在。比丘林這本書的問世與當時俄國發展狀況有一定關聯。19 世紀 40 年代，俄國對糧食的需求增大，迫使地主們尋求更先進的耕作方法，提高糧食產量。比丘林的《中國農業》應運而生。該書問世後立刻得到了社會的好評。一位匿名作者在《當代人》雜誌發表文章，感謝比丘林在書中介紹了大量有價值的資訊。當然也有人批評比丘林在書中沒有論及中國糧食的價格以及農業生產費用問題，沒能深刻分析造成中國人貧困的原因。

四、有關中國邊疆史地的翻譯和著述

1828 年，比丘林在聖彼得堡出版了他譯自《衛藏圖識》的《西藏志》。譯者在書中做了比較詳細的注釋，並附錄從成都到拉薩的道路圖。這是俄國第一本介紹中國西藏的書，立刻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同年在《莫斯科通報》（Моск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祖國之子》（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和《莫斯科電訊》等雜誌都有評論發表。《北方蜜蜂》開始發表先科夫斯基就比丘林所有作品所進行的評論。先科夫斯基對比丘林的《西藏志》大加讚揚，概述了書的內容。他認此書不僅為俄國帶來了榮譽，同時也屬於整個歐洲。他祝願作者以其勤奮和智慧繼續撰寫中國歷史和地理著作。1829 年，《西藏志》被翻譯成法語，由克拉普羅特加注。克氏認為比丘林在翻譯《衛藏圖識》時正確地理解了原文，但他最大的錯誤在於將魯祝華當成是《衛藏圖識》的作者。因為此書的作者實際上是馬揭和盛繩祖，而魯祝華只是寫了此書的序言。

1833 年，比丘林在聖彼得堡出版了《西藏青海史（公元前 2282—公元 1227）》（簡稱《西藏青海史》）。書中內容主要譯自《廿三史》和《通鑑綱目》。此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目錄：西夏人的起源；與中國的政治關係和戰爭；征服中國；中國與西夏人；與中國的政治關係；藏族人的起源；與中國的關係；戰爭。第二部分標題為：



西夏人；契丹人和中國人。書後附有西藏東北部和西部各省各個歷史時期的地圖以及古今地名對照列表。此外還附有幾篇文章，介紹中國的紀年方法、度量衡和錢幣。同先前出版的《西藏志》相比，此書問世後引起了東方學家們更大的關注。先科夫斯基首先在《北方蜜蜂》雜誌發表評論，認為此書結構安排和語言風格雖然不盡人意，但仍不失為一本值得歷史愛好者關注的著作。一位署名 C. M. 的作者在《傳聞》(Молва) 雜誌上撰文說比丘林的這部譯作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西藏和青海歷史著作，但依然對歷史學家們有很大的參考價值。波列沃伊在《莫斯科電訊》發表文章，稱該書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告戒讀者在閱讀此書時務須細心閱讀，深刻領會。施密特(И. Я. Шмидт, 1779-1847) 院士認為比丘林的譯作將給科學院帶來榮譽。

1828 年，比丘林在聖彼得堡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蒙古學著作——《蒙古紀事》，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編寫一部蒙古歷史曾是擺在 19 世紀上半期俄國東方家們面前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在這之前最緊迫的是要解決蒙古人的起源問題。科瓦列夫斯基(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ий, 1800-1878) 1837 年在喀山大學的一次集會上發表題為〈關於歐洲人對亞洲的認識〉(Речь о знакомстве европейцев с Азией) 的演說，指出歷史科學首先應該解決的問題是弄清亞洲自古以來有哪些民族在那裡繁衍生息，揭示他們的命運，反映他們之間的鬥爭以及驚濤駭浪過後的平靜。而比丘林的著作恰恰是對這些問題的最好解答。

該書共分 4 章。在第一章中他以詳實的資料描述了蒙古的地理概況。如果說這是對蒙古地理進行科學研究，可能有些言過其實，但他確實在努力描述這個地區的地理概貌，介紹他在途經蒙古時的見聞。這一章中主要收錄了他 1821 年從北京前往恰克圖時所作的日記。他認為 1807 年他在前往北京途中第一次見到蒙古時的日記不適宜出版，因為當時由於不懂蒙古語，日記中的許多看法比較「膚淺」。他在《蒙古紀事》的前言中寫到，他憑自己的經驗認為，如果一個旅行者不懂所經過國家的語言，就難以避免錯誤的印象。所以，作者在該書中收錄了他成為一個知識淵博、經驗豐富的東方學家後所記的日記。此時的他已經有能力甄別材料的真偽，將關於蒙古最鮮為人知的知識奉獻給讀者。此書第二章題為〈蒙古統計評述〉(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Монголии)，是極具科學價值的一部分。在比丘林生活的時期，所謂

統計述評指的是對一個國家的地理、經濟、政治、歷史加以描述和分析。比丘林將蒙古在地理上分成 3 個部分——南部、中部和北部，並分別進行了描述。他在這裡總結了以往所有有關這個地區的地理資訊，為進一步研究蒙古地理創造了條件。除地理知識外，比丘林還介紹了蒙古的政治制度、行政管理、社會階層、蒙古人的職業和喇嘛教的作用。在第三章中比丘林根據中國的史料(主要為《資治通鑑綱目》)敘述蒙古民族自遠古時期到 1653 年的歷史。第四章介紹清朝政府 18 世紀 50 年代征服準噶爾和喀什後頒布的法令以及對蒙古地區的統治方式。在該書出版的同時，其中的個別章節在俄國的幾個刊物上發表。

在該書中比丘林批判西方某些東方學家們關於蒙古人起源的錯誤觀點。他寫到，現在歐洲有許多學者研究居住在蒙古地區中各民族的起源，但他們並不真正瞭解這些民族及其歷史，在研究過程中接受了錯誤的思想，對所有問題妄加猜測，結果使人困惑不解。他們把某個民族強盛的一代人當作是一個單獨的民族，認為這一代在起源上和語言上都與前代不同。這是他們致命的缺陷。他認為蒙古人自古就在中亞地區居住，而「蒙古」這一名稱則起源於 13 世紀蒙古王朝興起之時。他將蒙古人的起源問題分成兩個部分來研究，一是關於蒙古民族起源，二是「蒙古」名稱的來歷。比丘林對中國史書中有關蒙古人的記載進行了詳細分析後指出，蒙古民族起源於西元前 2500 年前，而蒙古王朝於西元 9 世紀建立，12 世紀初進一步壯大，13 世紀初建立了蒙古帝國。他在《蒙古紀事》中第一次表達了這一觀點，而後一生都未放棄過。他認為蒙古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民族，他們祖祖輩輩曾有過各種各樣的名稱：韃靼、契丹、回鶻，突厥、鮮卑、匈奴等等。他在 1850 年發表於《莫斯科人》(Москвитянин) 雜誌上的一篇題為〈蒙古人為何許人？〉(Кто таковы монголы?) 的文章中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觀點。在該文中比丘林將中國的史書分為三類：朝代史、官方統計、官方編年史。他從各種性質不同的史書中挖掘蒙古人的資料，最終得出了與一開始完全相同的結論，即蒙古民族的起源和由於蒙古王朝興起而開始有的「蒙古」名稱的來歷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他在《古代中亞民族歷史資料集》(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 中同樣引用了許多漢籍譯文，證明自己的觀點。比丘林在研



究蒙古人起源問題時所採取的科學方法是俄國蒙古學發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許多學者認為他將民族起源和民族名稱分開研究是正確的民族學研究方法。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代表了那個時代俄國蒙古學的最高水準，在《蒙古紀事》出版的當年，他被俄國科學院選為通訊院士。

比丘林的另一蒙古學成就是從《元史》和《通鑑綱目》中翻譯大量有關蒙古歷史的資料。他只選擇有關成吉思汗、窩闊台汗、貴由汗和蒙哥汗的章節譯出，最後編寫成《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並於 1829 年在聖彼得堡出版。這部書介紹了蒙古民族的早期歷史，對研究蒙古民族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價值。比丘林之所以只選擇前四個蒙古汗來研究，是由於他認為蒙哥汗以後蒙古帝國發生了分裂，蒙古在中國的統治以及元朝的建立翻開了蒙古歷史新的一頁。他的這部譯作至今仍是這些中國歷史典籍的唯一俄譯本，每一個蒙古歷史學家以及每一個描寫 13-15 世紀蒙古人的作家都要不同程度地參考該書。遺憾的是，這部譯作當時沒有引起時人的重視，沒有書評發表。直到蘇聯時期歷史學家雅庫鮑夫斯基（А. Ю. Якубовский, 1886-1953）在其〈對十一至十三世紀蒙古人歷史的研究〉（Из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монголов периода XI-XIII вв.）一文中指出比丘林翻譯的《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可以與多桑（D'Ohsson, 1780-1855）的蒙古史著作相得益彰，通過閱讀兩位學者的作品，讀者可以全面地瞭解蒙古帝國以及成吉思汗。當然，雅庫鮑夫斯基也批評比丘林沒有從歷史的角度審視蒙古人的起源問題。

1929 年，比丘林出版了另一本邊疆少數民族史地研究作品《準噶爾和東土爾克斯坦志》。在該書中比丘林以《西域傳》、《前漢書》、《西域聞見錄》、《西域同文志》等漢語典籍譯文為基礎，介紹了西域的歷史和現狀。目錄如下：前言；古代地理名稱解釋（按字母表順序排列）；準噶爾歷史地理描述。書後附錄了古代地理名稱索引以及與 19 世紀地理名稱的對照表。比丘林此書的選題非常新穎，因為在這之前俄國還沒有一部介紹中國西部歷史的著作。同年，波列沃伊在其主編的《莫斯科電訊》上發表評論文章，給予這部書極高的評價。他說比丘林的著作在一些歐洲國家也很有名，而那是因為他熟知中亞地區的歷史和地理，所選擇的研究課題正是歐洲人最感興趣而又知之甚少的問題。

1834 年出版的《厄魯特人或卡爾梅克人歷史概述（15 世紀迄今）》（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ойратов или калмыков,

с XV столетия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同樣引起俄國科學界的好評，榮獲了俄國科學院傑米多夫獎金。在該書出版的前一年，他在《內務部雜誌》（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第 3 期發表了同名文章。正如比丘林在此書前言中所說，這是卡爾梅克人的一部早期編年史。他在撰寫過程中利用了《新疆識略》、《西域聞見錄》等漢籍，同時廣泛參考了歷史學家費舍爾（И.Э.Фишер, 1697-1771）、雷奇科夫（П.И.Рычков, 1712-1777）和漢學家利波夫措夫（С.В.Липовцов, 1770-1841）、列昂季耶夫（А.Л.Леонтьев, 1716-1786）、囉索欣（И.К.Россохин, 1717-1761）的著作和譯文。該書目錄是：蒙古征服中國；中國人在蒙古作戰；中國人同蒙古人和厄魯特人的戰爭；中國出使蒙古；談判；中國人將卡爾梅克人趕出西藏；中國與厄魯特人；中國與俄國。比丘林對全書作了詳細的注釋，書後附錄了人名索引。俄國漢學界普遍認為比丘林的這部著作同他以前的作品相比，獨立研究的比重加大，翻譯的比重減少。難怪比丘林署名時在「亞金甫神甫」後面加了一個「撰」字。比丘林利用了大量的漢語材料，使該書成為卡爾梅克民族歷史研究者的必備參考書。1835 年，先科夫斯基在《讀書文庫》第 11 卷發表題為〈卡爾梅克人、厄魯特人、維吾爾人——評比丘林的《厄魯特人或卡爾梅克人歷史概述》〉（Калмыки, ойраты, уйгуры. По поводу сочин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ойратов или калмыков）的文章，稱比丘林的書是「最出色的著作」，建議他出版法文、英文或拉丁文版，以擴大在歐洲的影響。

《古代中亞各民族歷史資料集》是比丘林的最後一部著作。1846 年，進入垂暮之年的比丘林忍受病痛的折磨，開始為此書收集資料。經過數年鏗而不捨的努力，他終於在 1851 年出版了這部有關中亞各民族歷史的集大成之作。此書初版時目錄如下：前言；中國人的歷史著作；匈奴；烏桓；鮮卑；柔然；回鶻；契丹；居住在中國東部的民族；西部中國。這部書使他再次獲得了傑米多夫獎金。1950-1953 年蘇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再版了該書的三卷本，並給予高度評價。

比丘林在邊疆少數民族史地研究中廣泛使用了漢語文獻，收集並翻譯了一大批珍貴資料。由於當時的考古學和人類學還很落後，不能為他的研究提供輔助材料，所以漢語典籍就成為唯一豐富而又可信的資料來源。他以漢語文獻為基礎的邊疆少數民族史地研究方法對俄國



滿、蒙、藏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 參

1830年，比丘林參加希林格科學考察團，前往當時中俄貿易的中心、位於喀爾喀蒙古的恰克圖。比丘林曾給俄國外交部亞洲司遞交過一份報告，介紹他在恰克圖的工作計畫：編寫一部詳細的漢語語法；利用中國人抄寫他編寫的部首分類詞典；為正在撰寫的文章收集更多的資料；按照俄國地圖和中國地圖印證中俄邊界；學習蒙古語；教授漢語。早在18世紀末就有人批評包括恰克圖商人在內的俄國商界忽視漢語學習，認為中國商人在俄語學習方面做得更好，在恰克圖經商的中國商人大都會講蹩腳的、攪雜中文的俄語。隨著19世紀中俄貿易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恰克圖商人決定建立一所漢語學校。此事早在比丘林從北京歸來途經這裡時就曾醞釀過。10年後比丘林再次來到恰克圖，當地商人的這一願望終於得以實現。

恰克圖海關關長在1831年3月17日寫給俄外交部亞洲司的信中寫到：「根據商人們的意願，亞金甫神父於去年1月10日自費開設了一個漢語班，學生人數達到10名。一些學生的成績非常好。」⁴根據這封信我們可以斷定，恰克圖漢語學校的開課日期是1830年1月10日，比丘林是學校的領導者和教師。1831年5月，恰克圖海關關長向俄國外交部亞洲司報告當地商人伊古姆諾夫關於開辦漢語學校的建議，說在恰克圖經商的俄國商人不僅懂漢語，而中國人所講的蹩腳的俄語又難以正確理解，經常由此而發生爭議和誤會。當恰克圖海關、俄國外交部、俄國財政部為漢語學校的隸屬關係而文牘往來不絕時，學校的教學工作一直在比丘林的領導下有條不紊地進行著。開課10個月以後舉行了第一次測驗，希林格、回國途經恰克圖的傳教士團成員、當地官員和商人都應邀出席。學生們回答考官的問題，朗讀了商業內容的課

文，並表演了漢字書寫。所有考官都對漢語學校學生的表現感到滿意。有趣的是，一直到1832年11月28日，俄國政府才正式決定成立這所實際上已經存在了1年半的恰克圖漢語學校。這一天亞洲司得到了沙皇的恩准，同意了伊古姆諾夫的建議，決定恰克圖漢語學校隸屬於俄國財政部，受恰克圖海關的直接監督，教師薪金由國庫支付。

比丘林在恰克圖漢語學校任教18個月後，因故回到聖彼得堡。1831年，第十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返俄途經恰克圖，當地商人要求將學員克雷姆斯基留下做翻譯並在漢語學校授課。克雷姆斯基起初似乎並不能夠完全勝任工作。1834年1月11日恰克圖海關關長曾致信亞洲司，要求亞金甫神父至少再來漢語學校任教2年，以恢復學校的秩序，出版他編寫的漢語語法著作。1835年2月初，俄國外交部長通知恰克圖方面，稱沙皇已經同意任命亞金甫神父和九級文官克雷姆斯基為恰克圖漢語學校教師。而後，比丘林又一次來到恰克圖，隨身攜帶了他剛剛出版的漢語語法教科書。1835年5月18日，學校又一次隆重地舉行了開學典禮。

這次比丘林為學校制訂了詳細的教學計畫。學校學制為4年。第一年講授漢語語法規則，並同俄語語法進行對比，弄清二者之間的差別。第二年繼續學習語法，同時進行商業內容的口語訓練。第三年重點鍛煉學員根據漢語語法規則進行擴展性對話練習的能力，翻譯程度適宜的文章。第四年除了繼續加強漢語口語訓練以外，講解不同交際環境對漢語辭彙使用的影響，訓練學生書面翻譯能力。在比丘林之前，無論是周戈、囉索欣，還是列昂季耶夫和弗拉德金的漢滿語學校⁵都沒有過教學計畫。所以，比丘林的這一具有一定科學性的教學計畫無疑為俄國的漢語教學法研究奠定了基礎。

恰克圖學校招收具有讀寫能力和算術基礎知識的青少年入學，實行免費教育，對學生的人數和年齡不加限制。成績優秀、為恰克圖貿易服務3年且表現良好者可以免除服役等公共義務。學校在1835年共招收了22名

4 轉引自 Скачков П.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俄羅斯漢學史綱), Moscow, 1977, 第109頁。

5 周戈原居中國，18世紀20-30年代來到俄國，後接受東正教，取得俄國國籍，1739-1742年間在俄國外交委員會開辦漢滿語學校，是第一個在俄國教授漢滿語的中國人。囉索欣領導的漢滿語學校1741年建立，1751年關閉，培養4名學生，這是俄國第一次在本土依靠自己的教師培養了漢學人才。列昂季耶夫曾是周戈漢滿語學校的學生，1763-1767年間在俄國外交委員會開辦漢滿語學校。弗拉德金於1798-1801年間在俄國外交委員會附屬漢滿語學校任教。



學生，他們都來自商人和小市民家庭，年齡從 7 歲到 21 歲不等。

1836 年，比丘林收到亞洲司要他繼續留在恰克圖的指令。是年 9 月，比丘林致信亞洲司，說他的漢語語法第二部分的編寫工作已經接近尾聲，在恰克圖漢語學校的教學工作也快結束了。儘管恰克圖的商人還繼續挽留他，但他難以從命，因為他需要回彼得堡整理他兩年來在恰克圖完成的著作。檔案中沒有保留下來亞洲司的回信，我們只知道比丘林又在恰克圖待了一年。在寫給亞洲司的另外一封信中他寫到：「我愉快地服從亞洲司要我 1837 年繼續留在恰克圖的指令，因為我的優秀學生們也希望如此，以便進一步提高對漢語的掌握程度。我認為有必要向亞洲司彙報的是，我在這兩年內為鞏固恰克圖漢語學校做了大量工作。學校開學後我非常重視學校的教材建設，除了我出版的漢語語法外，我還編寫了一部俄漢對照會話手冊，包括 18 類會話，完全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翻譯了這裡的進出口商品清單；重新編寫了漢語語法第二部分；將一部四卷本的漢語詞典譯成了俄文。明年需要整理這本詞典中的俄文辭彙，按字母表排列順序，簡化漢語檢字方法。」⁶ 信中所說的比丘林編寫的符合當地情況的俄漢對照口語教材至今下落不明。當然，這些信同時也表明比丘林當時留在恰克圖並非出自本意，與他的研究計畫不甚合拍。

1838 年初，比丘林回到聖彼得堡，恰克圖漢語學校由克雷姆斯基負責。8 月 25 日，來自買賣城⁷的一位清朝官員在恰克圖海關關長的陪同下參觀了漢語學校。12 月 18 日，學校舉行了公開考試，一批優秀學生脫穎而出。1841 年克雷姆斯基向俄國財政部彙報了學校根據亞金甫神父擬訂的教學計劃所進行的教學情況。後人從這個報告中得知，比丘林除了講授漢語外，還教授代數、俄語和宗教教義。克雷姆斯基在恰克圖漢語學校工作了大約 30 年。據克雷姆斯基的一位學生回憶，克氏的教學方法非常簡單，就是背誦比丘林編寫的漢語語法。儘管如此，我們不能低估他對於恰克圖漢語學校的作用。自比丘林離開恰克圖後，他一直負責學校的工作，每年都能培養一批漢語翻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為促進兩國人

民的交往和貿易關係的發展作出了貢獻。1854 年，克雷姆斯基被任命為俄國外交部亞洲司的七等翻譯。後來，他在英法聯軍侵華和簽訂不平等的《北京條約》時充當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Н.Н.Муравьев, 1809-1881）的譯員。1861 年，克雷姆斯基去世，恰克圖漢語學校的教學從此中斷。隨著俄國與中國關係的變化，俄有關部門認為可以直接派學生到中國去學習漢滿語言，沒有必要再在恰克圖開辦漢語學校，遂於 1862 年 11 月下令關閉學校。另外一個原因是 1837 年和 1854 年在喀山大學及聖彼得堡大學相繼成立了漢語教研室。恰克圖漢語學校至此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 肆

比丘林是 19 世紀上半期俄國最傑出的漢學家，是公認的俄國漢學的奠基人。他一生筆耕不輟，完成了大量有關中國歷史文化的譯著和著作，批評了某些源於西方的對中國的不實之詞，引起俄國廣大民眾對這個神秘東方大國的興趣，對俄國社會重新認識中國發揮了重要作用。

比丘林的著作在俄國漢學史上有著毋庸置疑的意義。別林斯基、科瓦列夫斯基、波戈金、波列沃伊、先科夫斯基是比丘林著作的最早評論人。俄國著名詩人普希金也對他的作品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比丘林以漢語典籍為基礎完成的有關東方民族以及中亞問題的譯著或論著激起了歷史學家們強烈興趣，他所提供的歷史資料和資訊在俄國是前所未有的，其著作內容廣泛、詳實，受到了評論者的一致讚賞。別林斯基在自己的著作中將俄國革命思想同中國的封建思想進行對比時，利用了比丘林著作中的材料。波戈金對比丘林漢學譯著和著述的意義有清楚的認識，一如既往歡迎他所寫的稿件。先科夫斯基認為，沒有任何一個東方學家能像頑強的漢學家亞金甫神父那樣從浩如煙海的東方文獻中整理出如此多的有關東亞的新穎而令人感興趣的事實與重要資訊。

與此同時，評論家們也對比丘林提出過一些善意的

6 轉引自 Скачков П.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俄羅斯漢學史綱), Moscow, 1977, 第 112 頁。

7 1728 年中俄訂立《恰克圖條約》，將恰克圖開闢為商埠。中俄商人在邊境兩側建立起兩座姊妹商業城鎮，形成兩國界隔貿易互市圈。其北市名恰克圖，為俄國商民居住區，南市名買賣城，是中國商民居住區。



批評或忠告。先科夫斯基建議比丘林不要將中國的行政管理體制與西方國家進行對比，而要將其與中國有某些共性的東方國家加以比較。波戈金建議比丘林改善自己的翻譯風格。別林斯基也反對比丘林在研究中將中國與歐洲進行對比，特別是將中國的官職與英國的爵位和法國的貴族封號進行對比的做法。他批評比丘林在反對某些西方學者對中國的污蔑時把中國理想化的缺點；他在評論比丘林的《中國的民情和風尚》時稱比丘林筆下的中國「身穿制服，彬彬有禮」，表示更希望看到中國「袒胸露背」真實的一面。

蘇聯時期，漢學家們對比丘林在俄國漢學史上的地位給予充分的肯定，撰寫了一系列研究論文。比較著名的有費德林（Н.Т.Федоренко，1912-2000）的《亞金甫·比丘林——俄國漢學奠基人》（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основатель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蘇聯科學院院報——文學與語言卷》（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1974年第4期）、西蒙諾夫（Л.В.Симоновская，1902-1972）的〈中國歷史學家比丘林〉（Бичурин как

историк Китая）（《莫斯科大學歷史系報告與公告》（Доклады и сообщения истор. ф-та МГУ）1948年第7卷）、戈爾巴喬娃（З.И.Горбачева，1907-）的〈亞金甫·比丘林的手稿遺產〉（Рукопис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Иакинфа Бичурина）（《列寧格勒大學論叢——東方學卷》（Уч. зап. ЛГУ. Серия востоковед. наук）1954年第4集）等等。1955年在切博克薩雷（Чебоксары）上演了話劇《尼基塔·比丘林》（Никита Бичурин）。1978年蘇聯漢學家克立朝（В.А.Кривцов，1921-1985）撰述了描寫比丘林一生的長篇傳記小說《亞金甫神父》（Отец Иакинф）。漢學家費德林為該書寫了後記，高度評價比丘林的漢學成就。他稱比丘林為「具有自由思想的僧侶」。吉洪諾夫（Д.И.Тихонов，1906-）說：「我們無須美化或貶低比丘林，在看待他的著作時應該考慮時間因素，要顧及具體的歷史時期。不能要求他用唯物主義思想正確地理解歷史問題。他的功績在於介紹了大量中國典籍，使俄國讀者瞭解了中國，以自己的文章或著作驅散了社會對於中國和東方民族的錯誤概念，堅決地在西歐學者面前捍衛了俄國科學的尊嚴。」⁸

漢學研究中心獎助外籍學人來華研究漢學計畫申請需知

※申請者必須擁有中國地區以外之國籍

※提供來回機票及每月研究費

教授級 NT\$55,000 副教授級 NT\$45,000

助教授級 NT\$35,000 博士候選人 NT\$25,000

※研究期限：三個月至一年

※申請文件：1.申請表 2.簡歷表（含著作目錄） 3.研究計畫 4.推薦函一封以上

※截止日期：每年4月30日

※如欲了解詳情，請與漢學研究中心聯絡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 電話：886-2-23147321 Fax：886-2-23712126

E-mail：ccsgrant@msg.ncl.edu.tw http://ccs.ncl.edu.tw.

8 Тихонов Д.И. Русский Китаевед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載《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954，179，сер. Востоковед. наук，вып. 4，第304頁。